薄薄的一點心意 算不得什麽祭奠

郭春林 新工人藝術團 2017-07-22

薄 奠

·郭春林·

一

老賈走了，在他的老家，據說是今天（6月19日）淩晨四點。無兒無女的他在那個時辰走，走得靜悄悄的。老賈是69年生人，比我小幾歲，但在蘇州的朋友圈中，大家都叫他老賈，也有叫“老敢”的，敢作敢當的意思。

老賈，有一個很傳統的大名，叫孝飛。QQ署名“假書生”。童年喪父的老賈只上過初小，現在的說法，實際上小學都沒有畢業，但在QQ空間，自2014年6月至2016年2月，他就用他廉價的智能手機，在勞作之余，在回家探親的時候，竟然寫下了9萬字。這還不包括我在建築工地上他和工友們居住的簡易宿舍中看到的好幾本筆記本上的文字，他還告訴我，在泗陽老家（眾興鎮賈莊）還有不少筆記本，也都寫滿了。筆記本是用很粗糙的紙很簡單地裝訂起來的那種，估計現在的小學生大概都不太願意用。而字跡是藍色、黑色的稚拙的字，並不工整，甚至還有些潦草，當然有很多錯別字。本子上記的都是他工余在別人休息娛樂的時候寫下的文字，其中也包括他為自己記的出工記錄。

老賈QQ空間最後的簽名是去年12月底修改的：“往前走，淩晨的故鄉，在濃重夜色中，星星不知疲勞地眨著眼睛，草上的露水無情地打濕了我鞋子，在那土路……”。那時候他還在昆山的工地上，可見其思鄉之情。但這也竟成了他真正離開的時刻和情境，惟願故鄉的露水沒有打濕他的鞋子，使他能夠在蘇州和老家之間常來常往。

二

老賈說蘇州是他的第二故鄉。三十二年前，他到蘇州打工，一待就是三十多年。幹過磚窯廠，撿過垃圾，做過小生意，最多的是在建築工地做小工。在蘇州打工期間，睡過橋洞，更多的是建築工地的工棚和簡易宿舍。他連在很多人看來很廉價的出租屋也沒有住過。當然，他也沒有蘇州的戶口，沒有與戶口綁在一起的所有城市人的社會保障，更不必說社會福利了。老賈這麽說，實在只是他自作多情。

老賈像當代中國億萬進城打工的工人一樣，開始時工資常常被拖欠、克扣，雖然說近年稍好，然而拖欠、克扣的現象仍然屢禁不止。正因為發生在老賈自己和他身邊工友身上的此類拖欠、克扣現象時有發生，兩個月前，老賈也開始學習起《勞動法》來，而且在網絡上，在工友們中間呼籲工友們要認真學習《勞動法》，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這是主流社會留給老賈們的最後一根稻草，可是，認真想一想，且不說今天的法律是誰制定的，又是為誰服務的，僅僅就訴諸法律程序的成本來說，他們也常常負擔不起，但這也是最合法的渠道，此外再沒有其他正式的途徑。老賈三十多年的打工生涯，辛辛苦苦，靠出賣勞動力換來的幾萬塊錢，在這次生病後，很快就花完了。他告訴我，每天的藥費就要三百多。

老賈患的是再生障礙性貧血，骨髓已經喪失了造血功能，據說是因長期營養不良造成的，這是典型的積勞成疾。富貴之人不會生這樣的惡疾，天道不公，屋漏偏逢連夜雨，窮人偏偏得這樣昂貴的病。高昂的醫療費無疑是雪上加霜。老賈躺在病床上，著急而愁苦，他還有將近八十的老母親，雖然有兩個健在的姐姐，但經濟狀況似乎也並不比他好到哪裏，更何況，老賈一直是個孝子，在他的筆下，常常可以看到對母親和親人的思念，對故鄉的懷想。因為不在親人身邊，所以思念；因為無法回到故鄉，所以懷想。他只能在逢年過節的時候回去看看親人。不是他不想回去，他一個人，就那麽點田，即便種上，也就只能養活眼下的自己，可是到老了，做不動了的時候，又怎麽辦呢？更何況他年邁的母親也還需要他照顧。而且，畢竟在外面打工三十多年，就如他在QQ空間中常常表露出的回鄉的尷尬之情一樣，“少年蘇州老大回，兒童相見不相識。見面還把我來問，笑說客人哪裏來。”這當然是對古典名詩簡單地置換，但敘述的卻是真實發生的事，表達的情感同樣也是真實的。可這還不是最根本的原因，最根本的原因是老賈雖然在蘇州打工三十載，卻並沒有掙來幾個錢。他告訴我們，現在他每天在工地做小工，一般淩晨四點多起床，五點過吃早飯，六點上班，中午吃飯加休息一共一個小時，下午四五點鐘下班，也常有更晚的時候。一天的工資是150元，這已經算是小工中最高的了，因為他還正值壯年，而他自己又很肯做，不少工友則因為年齡大，或者體力不行，就只能拿到130元，甚至只有100元。算下來，一個月似乎也有四千來塊，但建築工地上的工資不是這麽算的，它實行的是日薪制，做一天拿一天。拿慣了月薪、年薪的人多半不理解，甚至會覺得挺好。事實是，一方面，建築工地的工資並不是每天結算，基本上都是年終結算，平時的生活開銷不得不提前預支，或依靠原來的積蓄，常常不得不寅吃卯糧地去借債度日；另一方面，並不是每天都有活兒做，一年一般也就能做兩百來個工，忙的時候，也就是工程的合同交付期臨近的時候，沒日沒夜，趕工趕活兒，可勞動強度大，卻並不都有加班費，閑時多少天都沒有活兒做。如果按照學院中人的思路，覺得，哎呀呀，他們怎麽沒有按規定休法定的節假日和禮拜天啊，怎麽沒有三倍、雙倍，哪怕一點五倍的加班工資啊，他們為什麽不為了自己的合法權益去爭取啊……這樣的說法，在他們看來，就是一個笑話，可以一笑了之。老賈跟我們強調，你不做，有人做，老板根本不擔心找不到幹活的人，可是，你要不幹，就沒錢了，就連基本的生活保障也得不到了。

可是，老賈不知道他患的是窮人最不應該得的惡疾，要治愈，已經不是增加營養就能夠改善造血功能的，醫生說了，保守療法就是不斷地花錢輸血，但這也只是延緩生命而已。說白了，就是花錢買剩下的時間和生命，而且，很昂貴。唯一有效的辦法是骨髓移植，也要數十萬。一年多之前（2015.1.30），老賈在QQ上寫下了這樣的句子：“時間是什麽啊，時間就是我賈孝飛的掙錢機器啊，是我生命留在世上的腳印，時間就是生命啊朋友們！”他還給這句話取了個題目：“我和時間”。時間真的就是他的生命，但現在，這個生命需要他花錢才能買到。他不可能想到，他用一生中最強壯的三十年的時間去掙來的錢，竟然遠遠不夠用來延續他已入膏肓的病體茍延殘喘。這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勞動價值，是這個時代勞動價值序列中被排在最低處最底層的勞動力價格。雖然很多人都知道，今天，從我們的視野中消逝了的“剝削”早已重新回到了現實中，很多被消滅的魔鬼，諸如賣淫嫖娼、吸毒綁匪等等都在90年代以來因為擱置爭論但求發展的模式中覆活了，但如此過度的剝奪，即便在馬克思寫作《資本論》的時代，恐怕也並不常見吧。被過度剝奪的老賈當然拿不出這筆錢，老賈的親戚也拿不出、湊不夠這麽一大筆錢，窮人的親戚朋友還都是窮人。老賈也就只剩下一條路，花光所有的血汗錢，靜靜地躺在自己家徒四壁的破舊房子裏等死。

一個多月前，躺在病床上的老賈還豪情滿懷，壯志淩雲地說：“心在賈莊身在院！飄蓬姑蘇三十載！他時若遂淩雲志！敢笑書生貧血時！”（2016.5.12，“我不常病”）老賈想的是，不是說好的，好人一生平安嘛，不是說好的好人有好報嘛！他躺在病榻上反思自己，“我在蘇州沒有做過什麽壞事”，他因此想，正因為這個，姐姐姐夫才在他家裏及時發現躺倒在地上的他，並將他送進醫院的。（2016.5.10）但他並沒有等來平安和好報，而是留下白發蒼蒼的老母親，匆匆忙忙地去見他早在天國的父親了，可他的心裏一直放不下母親，在“白發送吃黑發淚”的文字中，他這樣寫道：“黑發貧血百（白）發愁！慈心做飯淚心頭！本該黑發敬白頭！哪有白發待黑發！母子本是肉中肉！白發不忍黑發病！早晚床前望兒好！”（2016.5.22）母子情深，躍然紙上，更令人不忍卒讀，不忍想象其情其景，我們不知道，老人在未來的歲月中如何接受這個事實。

三

老賈生病後給我打過電話，但我並沒有都接聽。懊惱的話說了要被某一類人視為矯情，甚至虛偽，不說也罷。也說過跟朋友一起去看他，自然也沒有能成行。最初的診斷書出來後，朋友托我在上海找找，看有沒有熟悉的醫生，能幫忙分析分析，也出出主意，遺憾也沒有能幫上忙。然而，沒有想到，老賈這麽快就走了。我不知道，他的親人是否會將他一直沒有舍得扔掉的那些筆記本全部燒化給他帶走，如果沒有，那他就真的什麽也沒有帶走了，他只帶走了對慈母、親人和故鄉的無限牽掛，此外，還給我們留下了幾萬字的QQ空間，讓想起他的好友們可以去看一看他曾經寫下的那些文字，讓朋友們只要一上QQ就能看到永遠停止在他永不更新的頁面，讓朋友們可以重溫與他一起交流、問候的快樂而溫暖的時光。我但願能在QQ上永遠保留他這一位好友。

實際上，春節過後，一直想著去蘇州，見見工友家園的朋友們，看看能不能做點什麽，也想再跟老賈好好聊聊，如果他能再找到建築工地的工作，又能順利地把我們帶進去，就可以接著去年12月份拍的一段工地視頻，繼續拍一點素材。雖然潘毅等人的《大工地——建築業農民工的生存圖景》通過民族志的研究方式，已經很真實地再現了建築業新工人的生存狀況，但以影像形式的再現似乎還沒有。但為老賈這樣的建築業新工人拍視頻並不是我們最終的目的，深入地了解他們的生存狀況也並不是我們最終的目的，無論是將他們作為研究對象，還是作為創作對象，都不是我們的終點，我們希望成為他們的朋友，我們更希望激活我們的知識，為改變他們的處境貢獻一點自己的力量，因為我們越來越強烈地認識到，改變近三億新工人的處境是當代中國最迫切的任務，也就是改變我們的社會最有力的體現。本著這樣的想法，我們希望在業余時間能夠一步步地實踐起來。然而，老賈就這麽突然離我們而去。而那一次在建築工地與老賈的聊天是第二次見他，也是我最後一次見他。

去年12月中旬，我第一次見到老賈。那天下午，我和工友家園的朋友從蘇州乘高鐵去昆山的花橋見他，其時已是傍晚，因為不認識路，耽擱了，下了班的老賈怕我們找不到，就早早地走到馬路口，在瑟瑟寒風中等著。見到我們，他搶著要付出租車的車錢。我們跟著他，路上聊些什麽已經不太記得了，主要是他跟朋友寒暄。我在背後或旁邊看他，其實也很不好意思，這是我的習慣。我看見他，平頭，穿著一件皺巴巴的半長風衣，裏面也就是件薄薄的毛衣，褲子也很薄，當然還有些臟，似乎倒也符合想象中的建築工人形象。可是講話卻聽不太清，帶著濃濃的蘇北口音，關鍵是口齒不清，聽起來有些費力。後來我註意到老賈的一只眼睛不好，瞎了，再後來聽他說是親戚的孩子不小心戳壞的。

畢竟是冬天，天色說暗就暗了下來，走了十來分鐘，經過施工的工地，夜色中即使有工地上的燈火，拔地而起的幾排高層建築看上去也還是黑黢黢的，路也因為前兩天剛剛下過雨，不太好走，我們這時就只能跟著他穿行在不是路的路上和建築物中。終於到了工地上他的宿舍。他帶著不無炫耀的心理，領著我們看了他的幾個好朋友。他的熱情介紹既令我難堪，也讓我羞愧。工友們倒也不掩飾他們的好奇和狐疑。那是我第一次見到建築工地上工友們的住宿狀況。我註意觀察了一下，住宿區在這個看起來並不小的工地的邊緣，大約有七八棟兩層樓的活動板房，一般每個宿舍五張上下鋪的鐵架床，幾張當然也是非常簡易的茶幾，小板凳。但我們看到的時候，因工程接近尾聲，宿舍都沒有滿員，一般也就是四五個人。他們雖然已經在工地住了起碼一年左右了，可宿舍裏依然空空蕩蕩的，甚至連一般意義上的放衣物的箱子和旅行箱都沒有，換洗的衣服或晾在宿舍裏，或疊或胡亂地擺在床頭床尾。有意思的是，一般工友的桌上只是零星的生活用品，鍋碗瓢盆之類，唯獨老賈的桌上堆了一堆書和雜志。書和雜志也並不是一般想象中的純文學書籍和期刊，基本上是以通俗文學為主，當然，也有他珍藏的發表了他的作品的《工友通訊》和一份江蘇某區縣文學社團辦的內部交流的刊物。而床上則是一床薄薄的褥子和被子，床板也就是一般的木板，穿著羽絨服的我忍不住問老賈他們，晚上冷不冷，他們都說還行。問了老賈同宿舍的另三位工友，兩位比老賈小幾歲，一位比老賈還大兩三歲，也就是說，他們都已經是五十左右的人了，而剛剛拜訪的他的幾個朋友以及他們宿舍的工友也基本上都是這個年齡，也許長期的體力勞動和工地簡陋的條件已經使他們練就了抵禦寒冷的習慣。

工地上有食堂，仍然是活動板房，大約能容納百十號人或坐或站著就餐，只是餐桌和凳子卻很少，估計也就夠三十來人坐吧。雖然食堂已經關門，但老賈跟食堂的師傅早就打好招呼了，我們仨就在食堂吃飯。老賈為三個人竟然要了六份菜，特意點了鹵雞塊、炒肉片等葷菜。即使我那時候並不知道老賈所患的病，也不太清楚他大概的收入狀況，我也可以從他的熱情判斷，這些葷菜平時他一定不會點。他自己帶了大半瓶白酒，應該是他原來沒有喝完的。於是，我們三個，就在空蕩蕩的食堂裏邊吃邊聊。糟糕的是我這個素無社會學和人類學訓練的人完全不知道該怎麽提問。當然，這是事後才想到的，但轉念再一想，恐怕也正因為我沒有那些專業訓練，老賈才把我認做朋友的。事實上，老賈的話我大概聽懂了六成左右，主要是老賈和朋友聊，我聽，偶爾插一句，問一問。食堂管理員來催了，我去付了錢，應該說還算便宜，才六十多塊錢。接著又去宿舍，跟老賈和工友們閑聊了會兒，他們很直接地問我來幹嘛。說老實話，我羞於說自己是來研究他們的，他們最迫切的需要並不是研究者，而是支持者和組織者，我也就只能含糊其辭地稱自己是老賈的朋友。看到有些工友已經洗漱準備休息了，我和朋友便告辭了。老賈把我們倆一直送上出租車，而且，硬塞給朋友二百元，說是飯錢和車錢。這就是我與老賈的第一次見面。

那天晚上，在去高鐵的車上，我就跟朋友說，是不是可以跟老賈保持聯系，看什麽時候有機會拍點東西。正好12月底學影視出身的蔡博既有興趣，也有熱情，更有時間，於是就有了與老賈的第二次見面。

四

第二次是下午到的工地，老賈正在幹活呢。他那天的工作就是用小推車把成堆的黃沙用鐵鍬鏟進推車，拉上並且倒進不遠處的攪拌機裏，稍有技術的一位工友按比例倒進適量的水泥，攪拌機工作，攪拌好的沙漿由另外四位工友，用兩輛小推車，裝滿後拉進施工電梯。兩台電梯對開，開電梯的是兩位年齡相仿約四十歲左右的婦女。沙漿運到樓上鋪地坪，鋪地坪的是另外一撥人。看起來老賈的工作也不能算有多累，但實際上這個活兒不僅需要持續的體力，也需要相當的力氣，從他大冬天只穿著一件薄毛衣就能看到。

蔡博拍了一些老賈工作的鏡頭，也乘電梯到樓上拍了一些鋪地坪的鏡頭。可惜開電梯的女工友不願意被拍，她們不知道我們是幹什麽的，她們以為我們是電視台的，可她們不願意以這樣的形象上電視。她們的工作需要自費參加培訓，工資也低於一般的小工。

老賈當然不能放下他的工作來陪我們，我們又拍了些鏡頭後，就按照老賈的囑咐，拿著攝像機準備去老賈的宿舍。路上就被小包工頭（當然，這也是後來老賈告訴我們的）盯上了，無論我們怎麽解釋，他都不允許我們繼續待在工地上，哪怕是老賈的宿舍也不行。我們不知道他怕什麽。無奈，我們只能在工地外的路邊等候。從工地的大門走到外面的馬路上要經過一條50米左右的水泥路，路的兩旁有大約十來個改裝成簡易房的集裝箱，有的裏面還有婦女和孩子。後來問了老賈，才知道住工地外面集裝箱的都是另外分包工程的工人，也就是《大工地》說到的新自由主義經濟體制中市場化的“分包勞動體制”。

老賈下班後打電話找到我們，一起去工地一兩公裏外的一個流動而集中的路邊排擋吃晚飯。他們用三輪車裝著爐子、炊具、食材、餐具和桌凳，也有專門賣煙酒飲料的三輪車，到下午五點來鐘，就慢慢地集中到這裏，擺開攤子，附近工地上那些實在不想吃食堂，或者來了親戚朋友的工人就約上來這裏吃喝一頓，算是改善一下夥食。排擋就在一個十字路口，附近除了馬路，就是正在建設中的工地，已經建成並交付使用的樓盤並不多，顯見是正在開發中的區域。這些排擋的主人其實與來吃喝的人屬於同一個群體，都是來自外地的新工人，只不過他們工作的類型不一樣，而且多是以家庭為勞動單位罷了。當然，官方的、學術化的概念是這樣定義他們不同的性質的，前者叫“受雇方式就業”，後者叫“自營就業”。

那天下午是晴天，但傍晚開始就變天了，刮起了大風，天氣隨著大風越刮越冷，穿著羽絨服的我竟也漸漸地感覺到透骨的寒風，但老賈的談興正健。這次他較為詳細地給我們講了這些年打工在外奔波勞碌的經歷。老賈說，他在蘇州已經打工三十來年，幾乎就是個蘇州人了。當初出來打工的時候是二三十個年輕人，那是在80年代末，家裏一個人也就一兩畝地，根本無法維持生計。這一晃就是三十年，現在每年也很少回家，老婆孩子都在老家農村裏，老婆是他小學同學，在當地打工兼種地，老婆在沒有生孩子前跟他一起在蘇州闖蕩，現在，十九歲的兒子、十七歲的女兒也都工作了，在工廠上班。家裏還有靠八十歲的老母親，和兩個姐姐。一直到這次生病住院，朋友去泗陽看他，才知道老婆孩子的說法都是老賈的“虛構”，實際上老賈只有短暫的婚史，據說是因為沒有生孩子，離了。直到現在，我也沒有想明白，老賈為什麽要給我們虛構一個完整家庭的故事？是虛榮心嗎？還是因為老賈慢慢地因為對文學的熱愛而遺忘了文學與生活的界限？但這樣的思路，即使說得通，也還是簡單的。

五

我不知道老賈從什麽時候開始給陌生人講述他完整家庭的故事的，但大概可以肯定的是應該有些年頭了。當初一起出來的同村人到城市後不久也都各奔前程了，老賈一個人在陌生的城市開始了完全不同於鄉村的生活，他需要面對一種始終處於流動中的社會關系，也需要在這個關系中重新建立起一個能夠既滿足他的生活需要，也能夠滿足情感需要的社會關系。問題是如何建立這一社會關系。前者由90年代以來日益自由化的勞動力市場提供，理想的狀態是賣方總能找到買方，買方也總能找到合適的賣方。然而，畢竟這只是理想狀態（實際上這一理想狀態與政府/國家幹預之間始終存在著密切的關系，在現代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環境中，根本不存在完全自由的市場），如果將其他因素考慮進來，顯然，在資本主導的勞動力市場，信息的不對等以及各種其他因素常常造成勞動力的過剩或短缺，無論哪一種，對普通勞動者而言顯然都是不利的，而像老賈這樣的勞動力在這一市場環境中必然永遠處於劣勢和末端，因為他們基本上就只是體力勞動者。也正因為此，老賈不得不絕大部分時間都在建築工地打工，我在工地宿舍看到的那些四十歲以上的打工者基本上也都屬於這種情況。他們是中國數千萬建築業工人的主體，而建築業的勞動狀況，可以不誇張地說，《勞動法》實施的情況與實際狀況之間的反差是當代中國各行各業中最大的，除了那些黑煤窯、黑工廠之外，沒有“之一”。在建築業，絕大多數像老賈這樣從農村來的新工人，基本上都沒有簽訂勞動合同，也沒有養老保險，沒有醫療保險，更不必說失業保險、生育保險、住房公積金等等，甚至連工傷保險都沒有。流動性、不穩定性，不安全感，以及高強度的勞動和糟糕的生活環境不可能對他們的心理和情感不產生影響。他們需要自己不被當作另類，需要融入這個時時變化的社會關系中，需要和絕大多數普通人一樣的故事，需要自尊和尊嚴，需要把自己心底的傷痛隱蔽起來，輕易不去觸碰，更不隨便示人。他們都是這個大時代裏的一枚浮萍，漂泊在異地他鄉，隨時隨地，更重要的是隨著風浪，一次次地聚散離合。於是老賈“虛構”了一個完整家庭的故事，以擺脫流俗的偏見和歧視，以故事對抗流言，更以此觸摸到了文學的真諦。所謂文學，不就是要在直面現實的時候還具備想象美好生活的能力，並將此能力和內容賦予其形式的存在嗎？我終於明白老賈為什麽不讓我們去他老家調查的原因了。他要守住這個屬於他的秘密，屬於他的夢想，他不想打破它。我甚至覺得這個秘密也是支撐他堅持在蘇州待下去的力量。

我想起了老賈跟我講述的他去年在家過年的情景。他說，過年回家，走親訪友，吃吃喝喝，很高興。他自己的家裏當然也要吃年夜飯，但是他和他老婆偏偏就要搞出點花樣來，他們一家四口，在除夕夜圍坐在一起，每人要即興寫詩一首，寫不出來，就罰酒。他說他老婆不行，他就給她出主意，你可以寫這個寫那個，兒子也不行，女兒還不錯。但老賈沒有說他們四個人最後都寫了什麽。實際上他也說不出來，這本來就是他想象的，也許還是即興的。但當時卻說得我這個文學博士和文學教授尷尬不已，也羨慕不已。現在想來，老賈真的希望自己有一個四口之家的小家庭，他可以用他只有初小程度的寫作能力使親人快樂地活著。文學在他那裏，已經特別結實地與日常生活粘連在一起了。這裏，並不需要學院中人誇張地將其視為反抗的形式，在老賈身上，它是樸實而真切地存在著的。因為這就是他的情感需要。但同時，像老賈這樣掙紮在生存底層的人更需要一個他們能接受的價值觀。

今天，時代和社會的主流價值觀看起來似乎是多元的，可實際上卻並非如此，占主導地位的是成王敗寇，而成功的標志就是金錢，至於如何獲得成功，幾乎不在討論的範圍，不擇手段也罷，錢權交易、錢色交易也罷，監守自盜，巧取豪奪，明爭暗搶……總之，只要成功，只要能完成自我資本的原始積累，只要能掙得個人的萬貫家財就是豪傑英雄，成功人士。勤勤懇懇的勞動者看起來似乎也有很多機會，可實際上絕大多數像老賈這樣的勞動者連通過個人奮鬥獲得成功的可能都不存在，而這樣的勞動者卻絕不在少數，他們辛勤地勞作，卻如螻蟻般生存在社會的最底層，然而，那些無論是高高在上，還是身處中產，甚至小資產階級分子都不願意承認他們的貢獻，不願意承認他們勞動的價值。看一看今天主流的歷史敘述吧，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我們取得了可喜的巨大的成就，這一切都是因為領導者有方，企業家有財，知識精英有智慧，與勞動者，特別是像老賈這樣的體力勞動者無關，即便是不得不策略性地把他們帶進來，從表達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其修辭的痕跡，更不會說他們才是創造歷史的主體，歷史的主人不再是人民群眾，而是政客、商人、資本家、知識精英。於是，歷史的創造者和歷史的主人分裂為兩個陣營；於是，人與人的關系在主流社會就只剩下了交換；成功與否的標準就只是個人財富的積累。想一想，像老賈這樣清醒地知道自己永遠不可能獲得那種成功的時候，他得有多強大的內心才能接受這一不公。於是，像老賈這樣的人常常會把命掛在嘴邊，但他們並沒有多少怨恨，不過是靠宿命論安慰自己，麻痹自己罷了；也有就信了佛，耶穌或其他種種宗教的。日益增多的善男信女，正是價值真空和功利主義、實用主義的癥候，很多時候也是弱者的依靠。

在老賈的文字中，常常見到他對生命的思考，他說：“生命是荒涼的，夢想是繁華的，在荒涼與繁華之中，我努力地實現夢想。可是夢想在哪？還不是在工地上做小工嗎？”（2015.1.5）面對無法改變的現實，他雖然不斷地以“人要像樹一樣堅強”（2015.1.30）來要求自己，也是說服自己，強大自己，可堅強的樹也需要有陽光雨露，老賈不奢望流俗定義的成功，可他需要對自己勞動價值的承認，因此當他發現工友家園的朋友正是以弘揚勞動價值為追求的人的時候，他簡直就義無反顧、全副身心地投身於其中了。他毫不吝嗇地將他所知道的最美好的最高級的讚美全都送給了工友家園。他用他所能的拙誠的打油詩熱情而真誠地高度歌頌它，不是因為它給他提供了什麽看得見的資助，只是因為它承認了勞動者的價值，因為他們把勞動者當成與所有其他人平等的人來尊重、敬愛，因為他們把勞動者失落的尊嚴真誠地歸還給了他們。老賈是幸運的，畢竟他邂逅了工友家園，畢竟在他離開這個世界前曾經有幾年是被承認的。老賈是不幸的，遭遇惡疾的追殺，但老賈又是幸運的，畢竟在他還沒有老到不能動的時候去面對老無所養的困窘和艱難，而無數的老賈們卻前路茫茫，他們還在勤懇艱辛地勞作，卻並不知道是否能換來一個平平靜靜的晚年，一個壽終正寢的辭世。

天氣越來越冷，我實在受不了了，也顧不得面子，跟老賈直說了，我冷，得回去了。老賈當然不會讓我們買單，只好由他去。先是我們送他到工地入口，沒敢進去，怕包工頭再啰嗦，可是，老賈不幹，執意把我們再送到馬路邊。寒風中，老賈一個人孤單地走回宿舍。我們相約，過了年再聚，我們一起去工友家園。然而，我終於沒有再見到老賈。

六

從得知老賈去世的當天在電腦上敲下這個文檔的第一個字算起，到今天已近三周。在這段時間裏，我去北京參加了一個高大上的國際學術會議，跟相熟的朋友也提起老賈的故事，但更多地是被這個高大上的會議所刺激而展開的討論，我和朋友們都驚訝於一個討論教育學與文化研究接合的可能性的會議，卻可以如此徹底地學院化、專業化、知識化、中產化，而不討論當代中國乃至當代世界嚴重的教育資源分配不平等的問題，不討論已經徹底淪為資本主義和中產階級生產關系再生產之重要途徑的高等教育的現狀，不討論僵化的學科體制的弊端，不討論鋪天蓋地的文化工業商品對世道人心的反面教育，不討論保羅·弗萊雷的“被壓迫者教育學”在今天的意義，不討論文化研究如何真正成為有效的文化實踐……我簡直不知道這是怎樣的學術，又是怎樣的一群人在做著這樣令人齒寒的學術。

我就甘冒天下之大不韙，說幾句真心話，如果經濟學只為有錢人出謀劃策，金融學只為老板們理財謀財，管理學只幫助剝削者更好地控制被剝削者，政治學只為當權者更有效地治理勞動者，文學研究者只為有閑階級研究什麽是美，社會學只提供資本家、商人和政客所喜歡的數據和分析……這樣的學術要它有甚鳥用！如果一套知識系統完全與社會最急迫的問題是脫節的，甚至是完全無關的，這樣的知識是“真知識”嗎？其意義究竟何在？如果一個時代的教育者傳播的只是成功學，這樣的教育者是合格的嗎？如果一個時代的文化產品宣傳的只是個人的愛恨情仇，甚至綠茶婊、心機婊、聖母婊等等滿天飛，或各種無厘頭的搞笑調情，這樣的文化不是毒品又是什麽？如果一個社會不把解決窮人、解決被壓迫者、被剝削者的問題當作最大的問題來面對，這樣的社會憑什麽說它是和諧的？如果一個國家不將社會正義、民主自由作為治國方略，這樣的國家還有合法性嗎？……我知道，我的憤激之詞會被斥為民粹，被批為道德綁架，然而，在我看來，這根本無關道德，也無關良知，而是事關尊嚴、公正和平等以及所有人的自由的權利，說到底，就是政治。

有的人還活著，但是已經可以從手機通訊錄中刪除了；有的人已經走了，可是你卻想永遠將他留在手機裏。對我來說，我希望永遠保存老賈的電話。老賈在，就是一個提醒，提醒我，不要忘記“眼光向下”這一晚清以來逐漸成為中國現代革命的基本共識，特別是在從未如此勢利的時代裏，在嚴重分化的現實中，其意義早已超越了倫理道德的邊界，而成為一個必須具備的知識方式和文化實踐的能力。因為如果從知識倫理的範疇來說，不過仍然是建立一個知識系統以及知識內部的等級秩序，這一秩序無論從哪個角度說，都不會根本改變老賈們的生存境遇，說到底，它仍然是一個反動的倫理學知識。想一想，近三億的新工人，月平均工資只有三千出頭，他們的孩子不是留守兒童，就是流動兒童，或者多半是第二代、第三代新工人，同樣的，他們的父母不是留守老人，就是流動老人，或者是第一代新工人，算一下這個數字，起碼有將近五億中國人是處於低收入階層，再加上大多數更低收入的農業人口。面對如此龐大的低收入人群，如果我們的知識仍然是現有的這一套，我們能從根本上改變這一狀況嗎？在我看來，實際上，這個人群和這一狀況就正是這一套知識生產出來的結果。要想依靠這樣一套知識來改變現狀，無異於癡人說夢。必須改造現有的知識，探索平等和正義的知識和文化的生產方式，探索公平和民主的文化實踐的可能，創造真正屬於窮人的知識和文化，才是希望之所在。

我並不想將這一使命視為道德，並以此去要求別的人，因為，在我看來，對已經躋身和正在努力躋身中產行列的知識人而言，並不是億萬新工人和農民需要我們，而是我們需要他們。這絕不是什麽情懷，也絕不是什麽浪漫，而是一個簡單的事實。我們的衣食住行，沒有哪一個能離開他們，我們仍然將寄身其中的城市和鄉村不能沒有他們，仍然將呼吸的空氣與他們有關，仍然必須吃喝的糧食和水與他們有關，更重要的是，我們原本就和他們共有一個環境，共在一個時代和社會，共屬於一個國家，居住在同一個星球上。沒有他們的尊嚴，就沒有我們的未來，未來屬於我們，也屬於他們。今天的眼光向下，是為了未來大家一起能夠眼光向上。

魯迅先生在生前的病中寫過這樣的話，“……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我相信，魯迅先生筆下那無數的人們絕不是達官貴人、教授精英，而是被壓迫者被剝削者，是“人民群眾”。是的，有些學者和媒體知識分子以及深受他們影響的人們都喜歡使用“公民”、“公民權”這樣的概念，大概是因為“公民”比“人民”洋氣吧，可是我還是喜歡使用“人民”這個集合名詞，喜歡它的土氣，更懷念它曾經被賦予的飽滿的政治意義。雖然我也知道“人民”這個概念現在常常被利用，而很多精英們，一看到“群眾”，就心驚肉跳，就想起群眾運動，他們更願意用“烏合之眾”稱呼他們。雷蒙·威廉斯曾經說，沒有烏合之眾，只有看到烏合之眾的觀察方式。因此，如果“人民至上”不是一個修辭，那就讓我們恢覆“人民”曾經的樸素面目，讓歷史創造者的“人民群眾”重新成為“主人翁”。

我沒有生花的妙筆，竟想不出一個合適的題目，就順手用了郁達夫先生一則短篇小說的篇名。雖然衷心希望能以此文代替我，給在天堂的老賈作一個揖，奉一杯薄酒，再敬上一根煙，雖然我也相信老賈對我不會有什麽不滿，因而不會拒絕我的祭奠，但我也在想，今天，難道我們真的只能再一次地重覆古人的話：百無一用是書生？然而，我不相信。也許，走出書齋，走到人民群眾中去，走進歷史真正的創造者（歷史的創造者只能是廣大人民群眾，而不是資本、政客和少數精英）的行列中去，才能使書生不再只是紙上談兵的角色，才能使自己變成對社會真正有用的人。

七

按傳統，明天是老賈的三七祭日。我沒有故意將定稿日期放在今天，這大概就是冥冥之中的安排罷。

老賈在未發現自己的病之前給我打電話時，說的最多的是他在QQ和筆記本上寫下的這些文字。他想出一本書，他說曾經有人跟他說，願意幫他。我一直將信將疑，甚至覺得這要麽是他的虛構，要麽就是那人是個騙子，因為老賈確實說過這樣的話，哪怕出點錢，他也願意。而我曾經跟他說，我要找同學幫忙，把他QQ上的東西整理出來，然後認真地讀一讀，幫他修訂一下，只改錯別字和病句，然後再找朋友設計一下，打印、裝訂成書。我估計老賈理解成了我要給他出書，所以，不時地會來電話問。老賈大概不知道，正規出版社正式出版一本書需要怎樣的條件，後來有一次，我給他解釋了，但我不知道老賈是不是真的聽明白了。可以肯定的是，出一本書，對老賈有很強烈的吸引力，畢竟，他在QQ上的署名是“書生”啊，雖然有一個“假”字，但這個“假”，是“賈”的諧音，是自嘲，是反諷，可我卻覺得它也是他的自我期許，是他想擺脫的一個形容詞。老賈要做一個真正的書生。

至今，同學幫忙整理的老賈的文字還在我的電腦中，匆匆忙忙離開了這個世界的老賈沒有來得及見到裝訂成冊的他寫的“書”。那就讓我來完成它，讓老賈作為一個真正的書生活在我們的記憶裏罷。也許，這是對老賈最好的祭奠。

 2016年7月6日淩晨完稿

 7月9日改定於上海